

藝通中外

東言西就
沈言

在構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願景之下，有關香港文化前世今生之種種，再度引起遐思遐想。面對「香港是文化沙漠嗎？」的世紀一問，每個人心中都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事實上，早在九十五年前，魯迅先生第二次來港，應邀進行兩場演講，其間一位青年寫作者就「香港是文化沙漠嗎？」即場提問，魯迅先生不假思索作答：「不可以這樣說，這樣說太頹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變的。」就此留下有關「文化沙漠」似是而非、模稜兩可的歷史懸案。

對於自幼便耳濡目染香港流行文化，在港片港劇港樂中成長起來的幾代人而言，實在難以苟同所謂「文化沙漠」的論斷。香港流行文化的光輝歲月，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熱浪，早已烙印成為熱血青春的不死記憶，既不能忘，也忘不了。

姑且不論香港一方樂土庇護了蔡元培、魯迅、茅盾、夏衍、許地山、戴望舒、蕭紅、張愛玲等南來文人，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孕育了文化播遷的繁榮；姑且不論香港一方淨土吸納了錢穆、

唐君毅、張丕介等名士大儒，以人文主義教育宗旨溝通東西文化，強化了中華文明的根柢；姑且不論香港一方水土滋養了有「南饒北季」之稱的國學大師之一，以中西文化薈萃的學術氛圍，成就了與季羨林比肩的饒宗頤……

且看作為東西方表演藝術中心、世界最大型藝術品拍賣市場之一的香港，亦從來不乏藝文元素：從古典舞蹈到現代戲劇，從流行音樂到傳統戲曲，從東方水墨到西方油畫……包羅萬有，異彩紛呈。每年春季的「法國五月」，夏季的「國際綜藝合家歡」，兩年一度秋季交替舉辦的「新視野藝術節」和「世界文化藝術節」等，以及佳士得、蘇富比等春秋拍賣，讓藝文的芬芳流轉四季。從香港藝術館到西九戲曲中心，從M+當代視覺藝術博物館到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從巴塞爾藝術展到亞洲當代藝術展，從大英博物館聯展到羅浮宮博物館聯展……本地、內地、亞洲乃至國際藝文盛事全年絡繹不絕。「香港藝術節」作為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國際藝術節之一，更是雲集世界各地頂尖藝術家和藝

團，燃點本港年度藝文活動高潮。而今，籌備經年的國際文化藝術博覽會——首屆「藝文香港 ART HONG KONG」，也終於正式登場。活動以「古今對話 中西互鑒」為主題，旨在打造一場具有「國際品牌、中國氣派、香港特色、紫荊影響」的文化與藝術盛宴，兼具現當代藝術展覽、國際藝術論壇、大師工作坊及導賞團等豐富內容和多元形式，可謂十分契合香港融會東西、貫通古今的文化特色。其中，現當代藝術展覽特別呈獻吳冠中、林風眠、傅抱石、徐悲鴻、齊白石、陳樹人等殿堂級藝術大師的經典畫作，專門展出林天行、王天德、郝量、梁遠華、劉建華、謝曉澤等知名當代藝術家的精品創作，再現守正創新的藝術表達和古今中外的視覺饗宴。國際藝術論壇則聚焦「藝通中外 文貫古今」，特邀香港M+希克資深策展人皮力、三藩市亞洲藝術博物館館長許傑、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香港海事博物館總監肖獻思等重量級文博嘉賓，圍繞傳統與中國當代藝術、博物館在中西文明交流中的地位與作用、香

港文化藝術產業的發展路向等話題展開對話，共同探討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美好願景。主辦機構還別出心裁將西泠學堂工作坊和大師班「空降」展會現場，特邀十位西泠學堂特聘名師現場親授書法、繪畫、篆刻等藝術課程，營造「人人感受藝文、人人享受藝文」的全民參與氛圍，讓現場觀眾零距離免費體驗藝文魅力，不免心生期待。

讀至此處，毋庸贅言，相信讀者諸君對於「香港是文化沙漠嗎？」之問，已有明確答案。

透雕荷花犀角杯

這是十八世紀清朝時期的犀牛角荷花雕刻，曾在香港藝術館展出。乾隆年間，犀角雕的器形種類豐富，有人物、杯、掛件、洗及仿古器形爵、鼎、羽觴。洗是文房用具，用來洗筆，所以又稱筆洗。爵和羽觴都是古代酒器，羽觴兩側有耳，像鳥的雙翼；爵前面有傾酒流槽，後面有尖尾，下面有三足，是天子分封諸侯時賞賜給諸侯的酒器；鼎有三足圓鼎和四足方鼎，又可分有蓋鼎和無蓋鼎。古代鼎主要用作烹煮食物，鼎下面幾條腿是灶口和支架，用於燒火熬煮食物。自從青銅鼎出現後，鼎又多了一種功能，成為祭祀時用的重要禮器。

犀角自古被視為位高權重的象徵，早在商周時代已有犀角雕刻，有些甲骨文給刻在犀角上。明末清初，雕刻與繪畫相結合，犀角雕層次豐富、書卷味濃，深得宮廷及文人墨客鍾愛，視之為高雅潮流。

透雕與浮雕息息相關。浮雕是在一塊平板上把要塑造的形象雕刻



文化什錦
荃葵

出來，使它脫離原材料的平面，雕刻出凸起的紋樣。透雕又稱鏤空雕，是把浮雕紋樣的背景部分掏空，細緻刻畫出紋樣的實體，形成虛實對比，顯出通透玲瓏的美感。

犀角本身有清熱、解毒、定驚、止血功效，豐厚外壁讓巧匠有施展雕刻才華的空間，成為歷代文人官宦珍視的藏品。據說犀角若跟毒藥接觸，毒藥便出現白沫，讓人知所警戒，因而特受帝王重視，製成杯盞等器具，以檢驗食物和酒類是否有毒。以犀角杯盞讓藥力溶於酒中，又有療病養身之效。漢唐時代，大秦（古羅馬帝國）、條支（今伊拉克）等國的犀角經由絲綢之路作為貢品帶進中國。唐、宋、明代，犀角在民間流傳，明清時代的雕刻技術更精湛。

上世紀末，犀牛被列入聯合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之中，犀角製品已被各國海關禁止出入口。物以稀為貴，在古玩文物和拍賣市場上，犀角製品價格一直在攀升。



透雕荷花犀角杯雕刻精湛。作者供圖。

求真與求善

近來參與策劃公益文化項目「秋閱冬讀」，冀望透過系列名家講座、城區漫遊和文創市集等，與愛書人分享秋收與冬藏的暖意和喜悅。首場講座活動於上周六舉辦，請來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金耀基和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原主任鄭培凱兩位著名學者，對談人文教育的意義和價值。

金耀基不單在社會學領域著作等身，更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於教育領域深耕數十年。其著作《大學之理念》自一九八三年面世以來，數次再版，至今仍是一眾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必讀書目。在《大學之理念》及後於二〇一六年出版的《再思大學之道》中，金公從不同側面省思大學之於社會發展之價值，尤其強調人文教育和通識教育的意義所在。是次講座中，他談及中國百年學術文化之變向，是由經學轉入科學，更巧妙地將《大學》的開卷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轉換為「大學之道，在明明理，在止於至真」，以佐證當今研究型大學對於追求科學真理的關注。

不論金公抑或鄭培凱教授，對於大學「求真」之道並無排斥，然



黛西札記
李夢

而在他們看來，大學於「求真」之外，亦應關注人文教育之於學生成長的意義，即「求善」和「求美」的重要性。對此，鄭培凱教授回顧自己於一九九八年在香港城市大學創辦中國文化中心、推廣人文美育的緣起與多年實踐心得。彼時，香港城市大學原校長張信剛教授找到他，希望他在這所以理工學科為主的大學推動通識人文系列課程，提升學生的美學素養和底蘊。他和團隊因此廣邀內地及海外不同界別的知名藝術家和學者如白先勇、葛兆光、潘公凱等，從戲曲、茶道、書畫、文學等不同範疇，與師生分享互動。

數十年來，系列講座、展覽和工作坊等活動豐富精彩，校內外反響不俗，卻仍免不了受到部分教師質疑，擔心這些課程無法為學生的求職與「搵食」帶來直接幫助。可在鄭培凱等人看來，教育既要關心專業知識，亦應重視人格精神，教給學生在「一日三餐營營役役之外，如何「做一個快樂的、幸福的人」。

追求真理與追求美和善，從不是對立的，而是殊途同歸。若教育從業者明瞭於此，則眾人心中理想之大學，絕非遙不可及。

空心「英大利」



英倫漫話
江恒

英國老牌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日前創造了一個新名詞——「英大利」(Britaly)，由英文British(英國)和Italy(意大利)組合而成，形容英國陷入政治亂局，越來越像意大利。豈料一石激起千重浪。

該名詞出現在雜誌封面的大標題上：「歡迎來到英大利」(Welcome to Britaly)，配圖是尚未下台的英國首相特拉斯，她身穿古羅馬士兵的服飾，一手持有披薩餅狀的盾牌，另一手拿着叉子，上面捲着意大利麵。結合當時特拉斯因施政混亂瀕臨垮台，而意大利又是出了名的走馬燈般更換國家領導人，單看圖文，其要表達的意思已呼之欲出。內文中詳細解釋了為何說英國很像意大利，除了前面提到的政治不穩定之外，經濟成長低也是重要因素。

這種帶有負面色彩的類比，自然引起意大利的不滿，該國駐英大使迅速作出回應，致信批評《經濟學人》極不專業，對意大利有着老掉牙的刻板印象。他鏗鏘有力地說了一段話：「雖然全球很多人喜愛披薩餅和意大利麵，但意大利是歐洲第二大製造業國家，《經濟學人》下一次封面的圖畫涉及意大利時，可以考慮用意大利的航空業、生物科技業、汽車業或醫藥業來代表，不論選擇哪個行業，都會更準確反映現今的意大利！」他言外之意是，意大利與英國不一樣，我們有強大製造業，可你們有嗎？

這的確是一記有力的靈魂拷問，也引發英國輿論的強烈回響，不少評論承認意大利人的話很扎心，反問「誰知道我們的製造業在哪？」英國工業衰落雖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在很多人記憶中卻不是如此，按英國長期主流論述，自十八世紀英國爆發第一次工業革命，隨着紡紗機、蒸汽機等重大發明紛紛問世，機器大量替代人工，生產效率極大提高，英國成為當時全球最領先的製造業中心。比如十九世紀英國經濟學家、「邊際效用」的創始人威廉·傑文斯，曾描述英國憑藉強大的製造能力，將世界變成自己的原料供應地：「北美和俄國



倫敦金融城一景。

資料圖片

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敖德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洲和西亞有我們的牧羊場；秘魯送來白銀，南非和澳洲的黃金流到了倫敦；印度和中國人給我們種茶葉。」這種畫面一代又一代地印入英國人腦海，讓無數人陶醉其中，又有誰會認真思考，隨着兩次世界大戰後大英帝國的瓦解和衰落，其工業已悄然流失。

真正加速英國去工業化的「功臣」正是戴卓爾夫人，英國學者史蒂文·伊文斯在《戴卓爾夫人的遺產》一文中指出，她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推動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非但沒有給英國的生產效率帶來實質性提高，反而令產業結構更加單一，國家朝金融和服務業大步前進，而工業卻持續萎縮。

實際上，戴卓爾夫人上台前，英國仍以製造業為主，其佔GDP的比重高達百分之四十，全國四分之一的勞動力也都在製造業。但她執政後，英國開始在去工業化的道路上猛突，鋼鐵、汽車、機械等傳統製造業統統被看成夕陽產業，不是轉移至國外就是轉型成高端服務業，結果到了九十年代，製造業的比重已大降至百分之十六。而時至今日，英國製造業的比重不足百分之九。用經濟界人士的話說，英國工業徹底崩潰，從一個昔日靠工業革命起家、曾經的世界工廠，淪落成如今產業空心化。也難怪當戴卓爾夫人去世後，大批失業的底層工人湧上街頭奔走相慶，高呼「那個臭婆娘死了！」

十分有趣的是，英國作家克里斯

蒂娜·科頓在撰寫《倫敦霧》一書時，原本探討狄更斯小說中的倫敦霧形象，不經意間卻從另一視角揭示了它所蘊含的象徵意味，即身為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人或許未能深切意識到，這種現代產業之霧不僅是一種倫敦特色，還是國家富強的體現。另一位英國作家伊夫林·沃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也有所洞悉，他在小說《打出更多旗幟》中暗示，霧的消退成了大英帝國衰落的象徵：「原先我們有霧濛濛的生活習慣，我們有一堆豐富的、模糊的、美得人窒息的話語，而如今霧消散了，全世界看到了我們現在這副樣子。更糟糕的是，我們自己也認同了這副樣子。」他要說的是，霧的消散是有代價的，大英帝國不再是那個主導着世界秩序的世界工廠了。

英國作為第一個工業化的國家，也是第一個去工業化的國家，付出了何種代價？美國學者德里克·湯普森在《大西洋月刊》十月號作出解答：英國選擇金融而不是工業，緊縮而不是投資，封閉經濟而不是對世界開放，導致其除去倫敦，成了西歐最窮國家之一。他列舉一例，英國人擔心機器人會搶走所有人的飯碗，但現實恰恰相反。從二〇〇三年到二〇一八年，自動洗車機數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而手動洗車工卻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至於經濟學家感慨道，「這更像是人類搶走機器人的飯碗。」

正如湯普森所說，英國去工業化除了令製造業變空心，並未變身成後經濟伊甸園，得到的是苦澀、搖擺不定和荒謬。

「最美二百米」



市井萬象

近日，江蘇南京，東南大學四牌樓校區大禮堂前池塘內飄滿落葉。被該校師生稱為「最美二百米」的梧桐大道進入最美觀賞季。

中新社